

日本武士道源流考述

娄贵书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4年的1899年, 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武士道》在美国出版后, 武士道也像樱花一样, 作为日本的象征而名扬欧美诸国。伴随着日本举世瞩目的近代化成就和经济奇迹, 伴随日本成为东方的战争策源地, 武士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熟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一浪高过一浪, 数学教授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一书, 甚至提出要以“武士道”和“物哀”来提升日本的国家品格。本文拟通过考述武士道的源流,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武士道精神。

关键词: 日本; 武士道; 源流

中图分类号: K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99 (2010) 03-0072-10

说到日本, 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 也会联想到武士道。“武士道作为我国的典型元素之一, 与樱花一样闻名海内外。”^[1] 武士道与樱花同属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然而, 两者对日本社会发展历史和民族文化形成的作用却不可相提并论。樱花不过是日本的国花而已, 即使寄托了日本人对于人生的某种理想, 也只是日本代表性的自然景观; 武士道则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构成日本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景观。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 制约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1000多年漫长岁月里, 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塑造有着不

可替代的影响, 在日本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和军事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成为日本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

一、武士道的名称

武士道起源于平安时代, 随着其物质载体武士的产生而逐渐形成。“武士之道在历史上登场, 大约是在平安朝中期的九世纪后半期。”^[2] 所谓武士道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就像武士在产生之初有多种称呼一样, 武士道在形成之初也有种种称谓, 武士道一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则比较晚。武士道名称的来历, 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列表作了如下详尽的介绍:

名 称	文 献 名
ますらむ	古事记
もののふ	万叶集
勇士の道	万叶集、士气古城再兴传来记
兵の道	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水镜、保元物语
弓箭の道	十训抄、竹崎五郎给词、绅书、岩渊夜话、小早川式部物语、丰萨军记、松隣夜话、丰内记
弓矢の道	太平记、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塙尻、明德记、镰仓大草纸、应仁略记、小早川式部物语、岩渊夜话

收稿日期: 2010-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日本武士兴亡史”阶段性成果 [编号: 07XSS003]。

作者简介: 娄贵书 (1954—), 男, 贵州桐梓人,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名 称	文 献 名
弓马の道	吾妻镜、北条早云寺殿二十一条、武家诸法度
武者道	信长公纪
武 刃 道	叶隐、翁问答
侍 道	可笑记、浮世物语
当 道	义贞记
武 道	甲阳军鉴、后太平记、平治物语、户田氏铁训、武刃咄闻书、北条五代记、明良洪范、肝要工夫录、退食间话、武人训、武备小学、明训一班抄、告志编、集义外书、信长记
武教（武治）	武治提要
武之道	飞驒国治乱记
士之道	山鹿语类、明良洪范、资治答要、武教小学、武人训、酒井忠进家训、细川义元记
士 道	山鹿语类、武治提要、兵要录、武人训、士道要论、告志编
武士の道	风雅集、今川记、常山记录、岩渊夜话、备前老人物语、虚名家记、菊池传记、武训、飞驒国治乱记、松のさかえ、武士训、武学启蒙、武教讲义
武 士 道	加藤清正七条、甲阳军鉴、武功杂记、明良洪范、备前老人物语、太平策、鸟居元忠遗书、板仓重矩遗书、松のさかえ、叶隐、武道初心集、武学启蒙、尚武论、士道要论、明训一班抄、武教讲义

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说，弓箭之道、弓矢之道、武道、武之道、兵之道、弓马之道及军之道等名称，弓箭之道最为盛行，其次是武道、兵之道、弓马之道、军之道等。“中世主要称弓箭之道、武道，近世则称为武士道、士道等”。^[3]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说，武士一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卷三、第四四三首的武士之训，相当于武士的名词主要有：“もののふ”（武士）、“ますらお”（大丈夫、男子汉、壮士）。同时，“もののふ”和“ますらお”有种种解释，“もののふ”的语义有物部、武士、武人、武者、つわもの、さむらい等，“ますらお”又有益荒雄、正荒雄、健男、男子中的男子等诸说。从古代向中世转变期间，武士又称为“弓马之士”、“弓箭之士”。与武士有上述名称相对应，武士道也称为もののふ之道、ますらお之道、つわもの之道、さむらい之道、弓马之道、弓箭之道、武道、武士道、武者之习、士道。^[4]此外，还有“坂东武者之习”、“兵之道”等。

井上哲次郎认为：大体上讲，武士道的名称出现于战国时代，德川时代开始广泛使用。德川时代还有“士道”、“武道”、“武教”的名称。山鹿素行在士道的名称下论述武士道，素行的门人大道寺友山则以武道为其著作的标题。《甲阳军鉴》“品”第四十七之中有“万世流转，第一即是义理，就此则不得不参照武士道。”宽永十九年（1642年）刊行的《可笑记》中多次使用“武士

道”。另外，加藤清正的《壁书》、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等也使用过“武士道”。明治维新后，则统一使用武士道至今。^[5]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一词才频繁使用”。^[6]“武士道一语在明治时代频频出现，同时，武士阶级的道德或者在武士中间产生的道义，也逐渐转变为国民的道德。”^[7]不过，无论是“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和“兵之道”，还是武士道，都是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名称虽然不同，但都共同指向武士的职业特征和生活方式，反映了武士道与战争的互动关系。

二、武士道的定义

在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对武士道的宣传和研究上，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当数新渡户稻造和井上哲次郎，他们都对武士道作了影响深远的定义。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第一章“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中说：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者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

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它既不是某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

井上哲次郎在其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讲演“谈谈武士道”中所下的定义是：武士道是我邦武士始终实行之道德，即武士的实践伦理。武士道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力量，而主要是精神上的力量。如果说只有武勇，那就是蛮勇，是暴力而不是武士道，暴力决不是道。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主干，是日本民族的精神。〔8〕此后，井上哲次郎又在《武士道总论》中强调说，如果从广义的日本精神讲，即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武士道是臣民遵奉天皇陛下之大诏的御精神在战斗方面的实行之道。^{〔5〕}

《日本国语大词典（17）》（小学馆，1975年版）“武士道”词条的定义：中世以降我国武士阶级中间发展起来的独有的伦理，以禅宗和儒教为据，大成于江户时代，分为两种观念，一是《叶隐》提倡的不问善恶是非、赌命效忠主君；一种是山鹿素行提倡的主君和家人都应该遵守儒教伦理而行动。

《日本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 1993年版）《武士道》的定义：武士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所谓“武者之习”、“武士之道”的主从间的忠义和武勇等规范，即武士应该遵守之道，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江户时代元和偃武的和平时代后，武士应该遵守之道呈现两个方面。一是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儒教立场的士道论，一是以山本常朝为代表的旧武士道系统的“所谓武士道，就是觉悟死”。明治维新后废除了武士的身分，但也出现了尊重其精神的“明治武士道”的词语。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名著《武士道》在美国出版发行。此外，在明治三十八年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編集出版了《武士道丛书》（全三卷）。

《广辞苑》（第五版，岩波书店 1999年版）“武士道”词条的定义是：在我国武士阶层中发展起来的道德。镰仓时代开始发育成长，到江户时代以儒教思想为根据而致于大成，成为封建支配体制的观念支柱。重视忠诚、牺牲、信义、廉

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情爱等。《叶隐》中说：“所谓武士道，唯死而已”。

有日本学者说：自古以来，武者之道就是“杀生之道”。讨厌武的行为者不是武者、不能战斗者不是武者，而是丧失武者资格的胆怯、臆病。武士终其一生，这种杀生道作为武士道的根本没有多大变化。^{〔9〕}

在我国，代表性的武士道定义主要有：《辞海》（1979年版）和《世界历史辞典》武士道词条的定义，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始于镰仓幕府时期，内容有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目的在于使武士忠实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万峰先生的武士道定义说：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早自公元 10 世纪武士领主（大军事农奴主）不断兴起以来，在武士集团内说就形成一套武士的道德规范。12 世纪末叶封建幕府建立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封建武士领主，更进一步制定各种“式目”（法规条款），用法律形式将封建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动准则固定下来，沿袭了几百年之久。“武士道”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强调主从关系的所谓“忠节”。封建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自己的主君，为主君坚持封建的节操。第二，强调武勇。封建武士必须磨炼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勇于为主君卖命。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把日本刀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第四，强调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崇佛，公元 1232 年制定的一个叫《贞永式目》的武士法规，头一条就强调武士必须敬神、保护神社和重视祭祀。第五，强调礼仪，按照封建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搞出许多清规戒律的“礼法”加以约束。日本封建武士道的主从关系，本是效忠封建武士的首领的。明治政府建立后，将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这种“武士道”精神，并且百般予以美化，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的士兵和人民。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的日本统治集团将法西斯主义同武士道精神揉和起来，使之“现代化”，成为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其反动性、野蛮性和腐朽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0〕}

笔者曾在《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武士道初探——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

德》(《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本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武士道的形成和作用》(载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武士道为虎作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文章中,还强调武士道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和“忠诚与献身之道”、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

其实,本来意义的或在战争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或“武士精神”,与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是武士作为“战斗者”在战场上履行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的生存方式,或者武士在战争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行动基准和理想追求,旨在驱使武士征战杀伐、“以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江户幕府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家思想人为加工的“近世武士道”,适应和平时代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需要,是武士作为“为政者”在榻榻米上治理天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旨在要求武士“得主尽忠”、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近代和现代武士道或者“皇道的武士道”,则是适应国家“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需要,由以山县有朋、明治天皇等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加工的武士道,旨在要求全体国民绝对效忠天皇,在侵略战争中“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三、武士道的德目

林子平的《学则》说:孝悌忠信勇义廉耻八字铭记于心。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列举的德目是:义、勇、仁、诚、名誉、忠义、克己。

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说:忠孝、节义、勇武、廉耻是早在封建时代就被承认的道德,尤以忠孝为最。追溯一般人的父母的祖先也都是为皇室服务的,子孙之忠与祖先之忠、子孙对父母与祖先对天皇相一致。忠比孝大,忠与孝对立时,便舍孝取忠,忠君与爱国全然一致。封建时代对作为主君的将军、大名尽忠节,乃是一时的变态,决非正常的状态。日本各个家族的户主即家长,而日本国家整体形成一个大家族,此大家族的家长就是天皇。虽然可以举出武士道的种种德目,但都归结为忠君二字。明治十五年一月四

日发布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必须实行的五条——军人必须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以质素,此五条精神中最重要的是诚心,以诚心为实行之精神。此诚心就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清明心”,诚心即清明心,清明心即诚心。《教育敕语》中“一旦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在实行时也要以诚心为基础,其与武士道精神并无二致。此清明心,此真心、此诚心,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完全符合我日本的国体。^[5]此外,井上还在《武士道全书》“序言”中强调,骑士道与武士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点,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并举例说“骑士道崇拜女性”,“武士道的固有精神是抑强助弱”,两者决不可同日而语。

西田直二郎的《日本武士道》说,武士道最重要的观念是忠君、义胆、勇烈、礼仪及其牺牲精神。作为武士的道义,最重大的是忠节。^[7]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将《家训》《家宪》中的武士道要项归纳为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诸德,进而列举了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敬神、廉耻、克己、慈爱、妇德十项武士道德目。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认为,镰仓武士道的内容主要是忠节、武勇、质素、礼仪、名誉、信义、清廉等要素,如果详细分类的话,有十余项,强调忠节和武勇精神构成镰仓武士道的两大特色。还明确指出镰仓武士的精神,是实践生活的训练、武士道训(贞永式目)的感化、禅宗的精神陶冶三方面薰陶的成果。实践生活构成镰仓武士道要素形成的中核,武士道训(贞永式目)的感化和禅宗的陶冶扮演辅助性的作用,支撑武士道向上发展。^[3]

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乃是近代武士道——“皇道的武士道”形成的标致和经典。《军人敕谕》规定近代军人必须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以质素为旨,构成近代武士道最重要的德目,该五条又以“诚心”为基础。《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克忠尽孝、恭俭持己、义勇奉公。武士道由武士的道德扩展为军人的道德和全民的道德,全体国民都要效忠天皇,做天皇的忠臣良民。

我国学术界的武士道德目,《辞海》(1979年版)和《世界历史辞典》的武士道德目是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万峰先生认为“武士道”的内容,第一强调主从关系的所谓“忠

节”，第二强调武勇，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第四强调宗教迷信，第五强调礼仪。^[10]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的《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第七章武士道的德目，包括忠诚、武勇、名誉、礼仪、廉洁、朴素、勤学七项。^[11] 笔者的武士道论述，将武士道的德目归纳为忠诚、义、勇、礼、诚、名誉、廉洁和勤学八项。

四、武士道的类别

对于武士道，日本学者有种种分类和解释。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它既不是某一个人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物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武士生活的发展。”^[12] 在此，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视为“武士的信条”，基本上属于德川时代山鹿素行的“士道”。

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总论》说，明治以后“武道”和“武士道”的名称都在使用，但其意义不同。“武道”在武艺的意义上使用，武士道则是指武道的原理、教理、教说，即意味着其原理具有哲学根据。而且，武艺从理想上说，也与武士道相一致。从文献上看，武士道分为三派，（1）皇道的武士道或广义的神道的武士道，（2）儒教的武士道，（3）佛教特别是以禅宗为基础的武士道。^[5] 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分为：（1）道德意义上的武士道，（2）技术意义的武士道。^[3] 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分为三类，（1）武艺及军略战法之类的武士道，如弓矢之道（弓箭之道）、弓马之道、兵之道、武道；（2）武士规范和职责的武士道，如侍道、当道、武士道、

士道（士之道）、武教（武治）、武刃道、勇士之道、武之道；（3）本来意义的武士道，如“ますらむ”、“もののふ”（勇士之道）、弓箭之道（弓矢之道）、弓马道、武者道、武士之道、武士道。^[1] 小泽富夫的《武士道史》分为：（1）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2）武士的为政者之道，（3）国家主义的武士道。^[2] 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分为：（1）自然产生的武士道，（2）传统的弓马之道、武者之道（创业之道）的武士道，（3）守成、守文之道的士道，（4）明治维新后的军人之道，即新武士道或天皇之道、皇国武士道，（5）仕奉封建主君的武士道和仕奉天皇的武士道。^[4] 在日本武士道学会編集出版的《武士道入门》一书中，原贞雄分为：（1）中世作为实践道德的武士道，（2）近世与儒学相结合的教义的武士道。^[13] 永安正幸认为：所谓武士道，由武道和士道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沿着两个方面分化和发展，（1）武道，即自古以来的卓越武术，或护身、或战斗中的攻击，是战争的技术、武器的使用方法、身心的修练；（2）士道，即山鹿素的武士道，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即武士的德性和行动指南的精神原理。^[14]

还有《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记载的：（1）平氏的“贵族武士道”，（2）源氏的“坂东武士道”；《今昔物语》说平安后期的两个武士道：（1）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2）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以及以武士道故乡命名的“坂东武者之习”，以武士道的载体命名的“武者之习”或“兵之道”，以武士的主要武器命名的“弓矢之道”等等。

上述内容基本涵盖了日本学者的武士道类别，大致可以概括为：

划分标准	类别（内容）
武士道的作用功能	战斗者之道和为政者之道、创业之道和守成之道
武士道的作用特点	实践的武士道、制度的武士道、理论（信仰）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特点	自然形成的武士道和人为加工的武士道、理论加工的武士道和权力加工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构成内容	武技层面的“武道”和道德层面的“士道”
武士道的承担者	封建武士的武士道和近现代全体国民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作用场所	战场上的武士道和政坛上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效忠对象	效忠封建主君的武士道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	神道的武士道、禅道的武士道、儒道的武士道

尽管武士道可以人为地划分为种种类别，但是，最基本的依然是“战斗者之道”，即武士的战争精神。

五、武士道的起源

关于武士道的起源，日本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1）神话传说起源论，（2）战争生活起源论。

“神话传说起源论”以井上哲次郎、佐伯有义等为代表。1901年，井上哲次郎在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演讲中宣称，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太古，在我国的神话中，可以看到武士道的渊源；历代的史实中也有武士道的痕迹，特别是大伴氏、物部氏等警卫帝室的武臣世家，充分体现了武士道的精神。^[8]此后，井上哲次郎又在《武士道总论》中进一步强调：“武士道是建国以来，不，是肇国以来系统发展起来的。”“追溯武士道的渊源必须追溯到神代”。从神武天皇至佛教传入的约1260年间是武士道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武臣世家的物部氏、大伴氏肩负护卫皇室、防御外敌的任务，武士道精神就是在此武臣世家发育、成长起来的”^[9]。

佐伯有义的《武士道史》在“第一期的武士道”中声称：“考之古典，武士道渊源极远，始于皇祖天照大神，在诸神的御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武士道。”并且分别通过“武士道的起源”、“天皇的御亲征”、“四道将军的派遣”、“日本武尊的御亲征”、“大伴连及其部族的义勇奉公”、“久米直の义勇奉公”、“物部连及其部族的义勇奉公”、“小子部栖轻的忠诚”、“调伴企雄和上毛野形名之妻”9个小节，以神话传说为依据，论述从神代至大化改新前的武士道。^[13]

文学博士蜷川龙夫说：我日本民族自古富有敬神尚武精神，这种敬神尚武的精神正是武士道的渊源，神代之时已经潜在，因此彻底完成我建国之大业。大伴、物部两氏作为天孙降临以来建国肇业之元勋，体现了日本民族纯正的武士道精神。^[13]菊池宽也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为主君舍一命。这种精神，即物部氏守护古代朝廷的精神。^[13]

正如我国学者李威周先生所说：“在作为武士道主体的武士尚未产生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什么无主体承担者的武士道呢。”^[16]显然，“神话传说起源论”是站不脚的、缺乏事实依据的、穿凿附

会的。

“战争生活起源论”，以桥本实为二战前的代表。桥本实认为：“研究武士道必须以武士道产生的时代为根本条件，充分把握这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政治形态，特别是经济状态，需要通过其土壤把握和阐明武士道生成发展的活动状况。”并且明确指出：“镰仓武士道是镰仓武士实践生活的产物。镰仓武士道的形成，镰仓武士的实践生活扮演了伟大角色。其中有三点是需要格外注意的，第一是恩给关系，第二是战场的训练，第三是谱代关系。”^[3]

战后的日本学者普遍持“战争生活起源论”。樱井庄太郎指出：武士道是从武士在战场上的实践生活中产生的，最初称为兵之道、弓矢之道等，进入近世后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学者而体系化，但是，实际上却常常陷入暴力道。^[17]河合正治认为：武者之习正是以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以尊重武者之名为首，知耻、只干不说、死中求活等特性，受到当时中央贵族的极高评价，这些构成后来武士道的渊源。武者之习的楷模，“坂东武者之习，在大将军面前，即使父亲战死、儿子被讨也置之不顾，越过父、子的尸体继续战斗”^[18]。家永三郎的《日本道德思想史》说：“武士的实践道德产生于武士的战争生活。”^[19]高桥富雄认为：武士道是以关东地方之风为母，以武士的武勇之职为父而形成的。^[4]《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说，与武士的产生一起，也随之产生了称为“武者之习”、“武士之道”的主从之间忠义和武勇等规范。^[20]小泽富夫说：所谓“道”，走的人多了自然就形成道。武士道，即武士走出来的道。^[2]被加工以前的武士道“兵之道”或者“武者之习”，是从现实的战争实践中产生的。^[21]

中国学者的武士道研究，以武士为武士道的物质载体，源自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

六、武士道的分期

日本学者武士道史的分期主要有：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的分期，（1）神武天皇至佛教的传入，（2）佛教的传入至镰仓时代，（3）镰仓时代至德川时代，（4）德川时代，（5）王政维新至现在（即监修《武士道全书》和发表“武士道总论”的1942—1944年）。

佐伯有义《武士道史》的分期：（1）天皇御亲征至大化改新，（2）从大化改新至源平盛衰，

(3) 从镰仓幕府至室町幕府, (4) 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至德川幕府, (5) 明治维新至现在 (即在《武士道全书》第 12 卷上发表其《武士道史》的 1943 年)。

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分为: (1) 武士登场和“武士道”的诞生, (2) 镰仓武士道, (3) 室町武士道, (4) 战国武士道, (5) 江户武士道, (6) 明治以降的武士道。

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的分期, 都认为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和武士身份的废除而划上终止符, 经过明治政府的继承和改造, 武士道由武士的道德发展为全民的道德。

我国学者的武士道分期以万峰先生的武士道分期为代表, 万峰先生在“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一文中, 按社会形态将武士道分为四大阶段。即: (1) “中世纪的武士道”, 从平安朝后期至江户幕府被推翻, 前后历时约 7 个世纪; (2) “近代武士道”, 从明治维新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世纪的武士道经过继承和改造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3) “现代武士道”,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日本战败投降为止, 其实质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 这是武士道发展、演变漫长历史上最不光彩、臭名昭著的时期。(4) “当代武士道”, 二战结束后直至今天, 法西斯武士道已不复存在, 作为一份伦理文化遗产, 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武士道诸德目, 在二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复兴及高度成长、实现日本现代化中又不断发扬光大。

本来, 武士道的分期就有多划分标准, 既可按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划分, 又可按时代特点和武士道功能的侧重点加以划分, 即按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和人生舞台划分。在武士道形成、发展和演变的 1000 多年漫长历史中, 其功能始终与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和人生舞台相一致, 武士道时而主要充当战斗者的“战争之道”, 如中世的武士道、近代和现代的武士道, 即战争时代的武士道, 主要用于驱使武士 (包括近代和现代武士) 征战杀伐; 时而主要充当行政官吏的“治者之道”, 如近世德川时代“偃武兴文”的武士道, 即和平时代的武士道, 主要用于为政者的自身修养。

即: 按武士道的历史地位, 分为平安时代的武士道、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和天皇的武士道三个的历史时期, 即“贵族之侍”的武士道→统治阶

级的武士道→天皇的武士道或全体国民的武士道。还可以分为封建时代的武士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武士道等等。

必须说明的是, 从 8 世纪末、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 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 1000 年漫长岁月中, 江户时代 260 年的“为政者之道”, 不足四分之一, 其余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 武士道都是作为“战斗者之道”而存在。

七、武士道与日本精神

在众多日本学者的武士道论述中, 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代名词。明治维新以后, 在政界, 掌握资产阶级政权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武士军人政治家, 运用国家权力, 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国民化, 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 先是通过《军人精神基本》、《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以武士道构建近代军人精神; 继之又通过《教育敕语》, 将武士道扩展为国民道德, 揭开了武士道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封建的武士道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武士道和“皇道的武士道”。在民间, 思想家或是参与起草构成“皇道的武士道”形成标志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如被世人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明治天皇的侍读元田永孚; 或是与政府相呼应, 不遗余力地宣传武士道, 如在国际和国内宣扬、鼓吹武士道的两大旗手新渡户稻造和井上哲次郎, 在其著作中将武士精神看作是日本精神, 并大力倡导继承和弘扬武士道精神。

1899 年, 即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四年, 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武士道: 日本之魂》在美国出版, 此书“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 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迅速引起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 被译成波兰、德国、匈牙利、俄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等国文字, 并且随着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名播海外。

1901 年, 井上哲次郎在“谈谈武士道”的演讲中称“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主干”^[8]。1942 年, 又在《武士道总论》中强调说, 如果从广义的日本精神讲, 武士道即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武士道是臣民遵奉天皇陛下之大诏的御精神在战斗方面的实行之道。

1917 年, 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

讲中声称“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22]。1932年,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认为:“武士道是构成日本国民行动的有力根基。”^[23]1933年,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说:“武士道虽非日本精神的全部,然而,武士道却是日本精神之精华。”^[24]1935年,桥本实在《日本武士道史》一书序词中甚至写道:“武士道精神处于人类精神之最高境界”,“武士道精神乃日本精神之中核,日本性格之骨髓”^[3]。1941年,日本武士道学会编集出版的《武士道入门》说:“樱花是日本人最爱的花,武士最充分地发挥日本人之特性。因此,以樱花为国家之光辉,以武士道为日本精神之精粹。”^[13]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武士的思想》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的大半。^[25]

有美国学者说: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新兴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26]“武士道,它对于探究德川时代或现代日本的价值与伦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7]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28]且不谈上述分析、评价是否客观和准确,但是,“日本历史上的武士、武士治国和武士道,在世界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武士道至今依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29]

八、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研究和武士道热,大致可以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

战前,从明治时代开始一步步升温,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不过,战前的武士热乃是日本“与万国对峙”的基本国策的反映。井上哲次郎称之为“战斗中体现的日本精神”,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政府出于国策的需要鼓吹武士道精神,广泛进行战争教育”^[30],“教

育敕语颁布后,‘武士道教育’、‘尚武主义’和‘武道教育论’在我国教育界再度复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进一步向国民大众宣称武士道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31]。我国学者李威周教授也指出了战前武士道热与侵略战争的关系,“这种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互为因果,同步发展,即利用对外侵略的‘赫赫战功’以宣扬武士道,又利用武士道来煽动对外侵略”^[19]。军国主义越是强烈,越是狂热地鼓吹“天皇的武士道”精神。通过向民众灌输“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使侵略战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将侵略战争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战前,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著主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井上哲次郎、有马佑政编集的《武士道丛书》3卷,田口义能的《武士道概说》、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井上哲次郎监修的《武士道集》3卷、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井上哲次郎监修、佐伯有义等编集的《武士道全书》13卷、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佐伯有义的《武士道史》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著作都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性质歪曲为正义的战争,并且认为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发扬了武士道精神”。井上哲次郎在《武士道全书》序言中说:“支那事变持续了四年半以上,接着又是大东亚战争,战争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时代愈来愈需要武士道研究”。“我日本今后不仅要研究和发扬武士道的精神,在将来的世界维持皇国之权威,而且,还必须充分培育武士道精神并使之传给子孙后代。”

战后,“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因扮演了武士道历史最不光彩、最臭名昭著的丑恶角色而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战后数十年,随着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随着日本政府回避和掩盖战争责任,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以“总理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00年,森喜朗首相公开鼓吹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神之国”,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后,公开表示要在任职期间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制定“有事法案”、在“终战纪念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

的战争责任政策进一步向“右”迈进。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日本社会又出现了“武士道热”，涌现出一大批武士道著作，企图重振武士道精神。由于“在今天，谈到武士道，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年初版）最为著名，即使是对1945年以降的战后的编者来说，武士道之深入浅出的解说，也不出于新渡户的作品”^[32]。因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被誉为“塑造日本人骨格”的“圣书”，成为日本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岩波文库收藏、矢内忠雄翻译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自1938年初版以来，已经出版了超过50版。”^[2]2000年1月，为纪念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出版一百年，又由《新渡户稻造全集》的出版社教文馆出版佐藤全弘的译本，佐藤全弘在序言中宣称：“本书虽历经百年，但意义却丝毫未减。”^[33]而且，就连翻译、解说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的著作，也极受欢迎。奈良本辰也翻译、解说的《武士道》，自1997年7月新装版第一版发行以来，到2008年2月，已连续印刷了53次。^[34]1998年，日本国书刊行会还重新出版了井上哲次郎、佐伯有义等人1942年配合战争形势专门编集的《武士道全书》13卷。该《全书》第一卷卷首的“刊行寄语”写道：“现代社会堕入非道的地狱，忘却了正义和耻，乃是忘记了武士精神而受到的处罚，必须加以自省。在此混浊的社会之中，《武士道全书》的复刻刊行，恰似黑夜之中的明灯。”^[5]数学教授藤原正彦2005年撰写的《国家的品格》是一部倡导通过效法武士和弘扬武士精神、提升国家品格的著作，短短一年时间竟然连续印刷25版，发行量超过250万册，2006年还被评为日本最流行的畅销书，在日本和不少国家引起巨大反响。^[35]21世纪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有日本学者说：“几乎少有像武士道那样被人为改变的思想”，“从明治维新近代国家形成以来，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继而昭和时期侵入满洲和中国，以及‘大东亚共荣圈’大目标下的战争时代，一部由政治家、学者、军人倡导的武士道，真不知在国民道德论和军人精神教育方面曾发挥过何等人为主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武士道因此反而消失，恐不过分。”总之，“以往的武士道研究是人为的武士道论，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被改变了的产物，而非对武士道固思想的阐扬”^[3]。“‘新渡户稻造的武

士道也不是以文献的、历史的武士实态为依据’，现在我们知道的武士道是明治时代产生的近代思想，应该将称为‘明治武士道’的武士道，与本来的武士道相区别。”^[35]与自然形成的武士道相比，人为加工的武士道，更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古贺斌著、香内三郎解说. 武士道论考 [M]. 岛津书房, 1974 1 61-65.
- [2] 小泽富夫. 作为历史的武士道 [M]. ペリカン社, 2005 18 167 240 10 245 1-2.
- [3] 桥本实. 日本武士道史 [M]. 地人书店, 1935 9-11 133-174 10-11 74-76 序词 1-2.
- [4] 高桥富雄. 武士道的历史-1 [M]. 新人物往来社, 1986 37-40 (第一卷) 194 (第二卷) 173 (第三卷) 150-154 29-30.
- [5] 井上哲次郎监修. 武士道全书-第1卷 [M]. 国书刊行会, 1998 21-22 26-27 27-31 23-24 40-43 24 32-33 刊行寄语.
- [6] 丸山敏秋. 道德力 [M]. 风云舍, 1999 163.
- [7] 西国直二郎. 日本的武士道 [M]. 岩波书店, 1934 48 25 27.
- [8] 井上哲次郎监修. 武士道集-上卷 [M]. 春阳堂, 1934 2 -3 6-7 3.
- [9] 别册历史读本 30-武士道——侍的志气和魂 [M]. 新人物往来社, 1995 18.
- [10] 万峰. 日本近代史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8 95 -97 95-97.
- [11] 林景渊. 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 [M].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1993.
- [12]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 [M]. 商务印书馆, 2001 1 14-15.
- [13] 武士道学会编. 武士道入门 [Z]. 150 28-29 130 90.
- [14] 多田显著、永安正幸解说. 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 [M]. 丽泽大学出版舍, 2006 204.
- [15] 井上哲次郎监修. 武士道全书-第12卷 (第一章) [M].
- [16] 李威周. 论日本武士道 [Z] //中日哲学思想论集. 齐鲁书社, 1992 274 285.
- [17] 櫻井庄太郎. 名誉与耻辱 [M]. 政法大学出版局, 1971 325.
- [18] 河合正治. 中世武家社会的研究 [M]. 吉川弘文馆, 1985 24-25.
- [19] 家永三郎. 日本道德思想史 [M]. 岩波书店, 1984 149.
- [20] 丁村效等. 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 [M]. 东京堂, 1993 190.
- [21] 关幸彦. 武士的诞生 [M].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9 184-185.
- [22] 山风铁舟口述、胜海舟评论、服部真长编. 新版武士道——文武两道的思想 [M]. 大东出版社, 1997 169.
- [23] 田中义能. 武士道概说 [M]. 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 1932 15.

- [24] 平泉澄. 武士道的复活 [M]. 至文堂, 1943. 6
- [25] 相良享. 武士的思想 [M]. ぺりかん社, 1984. 5
- [26] 霍尔.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 [M]. 商务印书馆, 1997. 74.
- [27] 贝拉. 德川宗教 [M]. 三联书店, 1998. 111
- [28] 沃尔夫. 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 [M].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5. 116—117.
- [29] 万峰. 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 [J]. 世界历史, 1994 (3).
- [30] 风间 健. 武士道教育总论 [M]. 壮神社, 2002. 218
- [31] 坂田 茂. 近代日本的爱国思想教育—上卷—2 [M]. 星云社, 1999. 777—778
- [32] 多田显著、永安正幸解说. 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 [M]. 198
- [33] 新渡户稻造著、佐藤康弘译. 武士道 [M]. 教文馆, 2000. 6
- [34]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 [M]. 奈良本辰也翻译·解说. 三笠书房, 2008
- [35] 时野佐一郎. 真实的武士道 [M]. 光人社, 2008. 9—13. 11.

[责任编辑: 闵 军]

Probe into the Origination of the Japanese Bushido

LOU Gui shu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of Bushido in English written by Nitobe Inazo in America in 1899, four years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makes Bushido known to Europe and America as the sign of Japan as cherry blossom. The great economic progress and modern achievement in Jap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riental source of war helps Bushido to be known to more and more nations and states. Since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the topic of Bushido has been at the front once again and kept up and up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National Character, Masahiko Fujiwara, the writer and mathematics professor, intended to advocate Bushido and Mouming, with which to upgrade the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s.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spirit of Bushido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Bushido.

Key Words: Japan; Bushido; origination